衝撞：歧見與共識交疊

陳思妤/國立政治大學/法律系

115 年所修課程：多元文化與社會正義

我們永遠在金屬和玻璃背後，我們多麼懷念那種碰觸，於是只能衝撞彼此，只有這樣，才讓我們感覺到些什麼。」

在豔陽之下，我走進矗立在廣闊校園內的綜合教學館。「多元文化與社會正義」的教室寬敞明亮，梁柱間卻不時傳來激辯交響。

在參與這堂課之前，我總是習慣在社會議題的辯論中尋求勝負，選擇立場對我來說就像是一場零和遊戲，一方受挫相對的是另一方志得意滿，但結果往往帶給我滿腔空虛。於是在課程列表上看到這門課的介紹之後，我決定報名，試圖在這門課中尋找立場撕裂的另一種可能。

帶著這份對衝撞的渴望，第一週課堂開始了。自幼生活在台北市大安區的我，對街頭徘徊的無家者抱持著直覺的階級觀念，輕易地被邊沁基於功利主義所提出的「勞動濟貧所」說服，只要限制少數無家者的自由，換來多數市民的安心與都市整潔，同時拯救了無家者無從溫飽的問題，有何不可？然而，老師在如火如荼地討論後，在課堂上播放的一個社會實驗影片，卻向我展現了工具理性背後的道德深淵。「店家是否有權拒絕無家者入內消費？」，影片中一位老者眼見店家驅趕試圖用餐的無家者，果敢挺身而出為其駁斥店家，甚至落淚並對其說道：「我們都曾在人生中跌落谷底，那時有人幫助了我，現在輪到我幫助你，我們不會永遠處於幸運的位置，也不會永遠處於不幸的位置。」在感動之餘，我不禁反思，如果店家有權以「維護其他客人用餐環境（多數幸福）」為由，驅趕「不配出現在餐廳的人（犧牲少數幸福）」，那這條分歧我族與他者的線是否有邊界？還是會在將來無限制地擴張？我們是否也能基於這種理論，將少數性族群、特定政黨背景或特定國籍人種拒於門外？

對多數幸福進行盲目計算的功利主義觀點，在代孕合法化的爭論中再次令我無言以對。課堂上的對話辯證過程中，我詢問「代孕是否等於買賣子宮和胎盤？」，教授以「租房子」為喻回應，認為胎盤可以歸還給女性，代孕比起買賣，反而更像是一種服務，就如同出租房子一樣，退租後仍可以將房子打掃乾淨交還；如此一來，在符合交易自由的前提下，功利主義觀點認為代孕交易能為雙方帶來最大快樂與滿足。對此我感到極度悚然。將女性的子宮比喻為出租公寓，本質上就是明目張膽的物化，將代孕視為多數幸福的人，往往只將自己傲慢

Summer Colleg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

地代入消費者角色，卻刻意忽略了供給者所面臨的身體異化與折磨，懷孕與生產所帶來的身心耗損，絕非「打掃乾淨」四個字，便能輕描淡寫地劃入效益計算機，與委託者所得幸福一一抵銷，更何況在經濟弱勢或資訊不對等的情況下，代孕者所做的選擇是否真的完全出於自由意志？抑或將生育、子宮與生命視為商品，是否嚴重貶低了人之所以為人，應享有的人性尊嚴？這些都有待辯證。某些德行，是無法藉由供給需求線，得出市場價格來加以衡量的。

撇開了器官與尊嚴商品化，我們進一步叩問國家體制與歷史責任。在進行積極平權政策的正當性檢驗時，同學之間針對原住民加分政策的優劣與公平性開啟熱烈討論。我當時採支持立場，加分是對過去威權政治貶損少數族群的語言與文化之補償。然而隨著討論白熱化，迫使我們直視一個更核心的哲學命題：種族，究竟是一種隨機因素，還是人們必須承擔的集體責任？當政策試圖以人為砝碼操控天平，來彌補歷史的坑洞時，我們是否只是在創造新的階級對立，讓另一群無辜的世代受困，同時使少數族群背負著反向歧視的重擔？

國家權力與自由至上主義的交鋒，在兵役制度的討論中顯得更為尖銳。即便身為女性，我始終堅定主張，保家衛國不分性別，應實行全民義務役。但這隨之衍生出我真心的疑惑：如果國防是至高無上的國民義務，為何同樣是拿生命安全守護社會的警消人員，卻不套用義務役制度？難道在國家機器的視角，維護社會治安與家戶平安的重量，屈居於國家國防之後？可以全民皆兵，難道不能全民皆警、全民皆消？我們究竟是用什麼標準，來劃定犧牲自由的範圍？

原本以為在課堂上能發掘真理的我，最終只迎來以上問號，然而，在這趟不斷推翻與重建的思辨之旅末尾，老師引用羅爾斯的「合理歧見」給予了解答。我逐漸明白，在多元社會中，意見歧異是必然且必須的常態。我們不需要在每一次爭辯中，吵到翻臉只為尋找一個絕對真理，而是應該透過批判思考、關懷他者與敘事想像，在無盡衝突中形成得以安身的交疊共識。

歧見固然鋒利，但正因我們直面彼此，讓我們在金屬與玻璃之後，重新確認了彼此生而為人的溫度與重量。我很感謝這堂課帶給我與他人衝撞的機會，讓我跳出舒適圈，擺脫思考慣性帶來的自傲，嘗試換位思考，結出與過往截然不同的思想果實。

Summer College
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